

论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辩证关系

林伯海

【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观基础，确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性，奠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场域，为其提供了现实主体、划定了时代边界。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辩证统一于“两个大局”的统筹与把握之中。

【关键词】 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作者简介：林伯海（1964-），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1756）。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不确定性增强。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认同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历史潮流、契合了时代需要、回答了时代之问，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实践场域。进一步梳理二者的辩证关系，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价值认同基础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既不存在一个能够凝结各成员的类似主权国家那样的行为主体，也不存在一套协调成员间关系的类似国际法那样的规则规程。那么，靠什么东西来凝聚共识，形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行动呢？那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有找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基础，才能形成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和方案的认同，才能真正汇聚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

^①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求是》2021年第16期。

1.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道义确证

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并付诸共同的实践，离不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确证。列宁指出，在革命的斗争中“赢得的巨大的无可争辩的道义上的威信，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①。这里所言的道义，既包括政治方面的道义，也包括价值观方面的道义。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要通过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确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与价值观的道义性。

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确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交往主体的全体性与平等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实践，还是一种人类的交往方式，而全部主体能够平等地参与交往是公平正义的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导向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体交往主体基于平等地位的交往舞台。全人类共同价值内含的“和平”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努力构建，而不是“霸权稳定论”“单极稳定论”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内含的“发展”是各个国家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发展，是各国共建共赢共享的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内含的“公平”“正义”的实现必须同平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平正义既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和分配公平而使人能各显其能、各得其所，从而激发人的创造力和创新活力，也因注重结果公平而使人们之间和谐相处，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②全人类共同价值内含的“民主”“自由”彰显国际关系民主化特质，是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民主与自由。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交往主体的全体性与平等性。

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确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交往方式的公平性与正义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要弘扬的“公平”是按照相同的原则分配公共权力和国际资源，处理及评价国际事务。中国坚持公平原则，从不搞“小圈子”式的政治集团，不以意识形态区分合作模式，不搞双重标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不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发展程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宗教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国家均按照自愿、合作、共赢的原则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基于正义价值导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共有的良知出发，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最重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切理念和实践，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维护的是世界人民的安全，谋求的是世界人民的利益，实现的是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无论是消除疫情影响、重回生活正轨，还是平息冲突动乱、解决人道主义危机，根本上都要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③可以看出，在所有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全人类共同价值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底色，确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性。

将平等的结果和公平的程序完美结合起来的理想目标，便是人类追求的另一个基本价值，即社会的正义，这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所确证的道义原则。

2.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价值共识

当前，尽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认可与赞誉，但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即“如何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中塑造一种共同体意识”，同时又在中心国家的挑战、国际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和平共处、交流互鉴等问题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④。这些挑战和问题的背后都关涉价值共识与价值认同的问题，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应对这些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共识与认同基础。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2页。

② 王玉周：《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求是》2014年第11期。

③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页。

④ 参见阮建平、林一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挑战与建设路径》，《中州学刊》2018年第11期。

首先是民族国家的挑战。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交往的主要行为主体，如何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中塑造一种共同体意识，这无疑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民族国家的一切行为无疑都是以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以致于“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成为名言。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纵深发展，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亟待各民族国家树立共同体意识，以实现合作共赢。实际上，人类早就认识到国家间建立联合体的重要性。康德就曾经说过：“只有当这些国家联合成一个普遍的联合体的时候，这种联合与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家相似。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建立一种真正的和平状态。”^①自17世纪中叶民族国家在欧洲大陆诞生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结成了不同的国与国相互联合的国际体系，主要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这些国际体系也是一种共同体。伴随着这些国际体系的产生和更替，人类的共同体意识随之生发。遗憾的是，这些共同体都建立在强权、霸权的基础上，是虚假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是单边一元、对抗零和、我先他后、我优他劣的拉帮结派式的共同体意识。而中国提出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不同于任何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体系，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其价值导向，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真实的价值观基础。建立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新型安全观的和平的共同体，是坚持共建共享共赢的发展的共同体，是发展机会更加均等的公平的共同体，是“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正义的共同体，是“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的民主的共同体，是每个国家都能“独立自主选择本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自由的共同体，这一价值共识与认同能够有效应对传统型民族国家的挑战。

其次是中心国家的挑战。从价值观角度讲，中心国家的挑战来源于其强权至上、本国优先的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存在一个或极少数位于中心的国家，这些国家以高于其他国家势位的姿态决定国际规则、设置国际议题、主导国际政治走向。当国际体系因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时，守成国家总是不甘于轻易放弃其中心与优势地位，动辄采取遏制、打压、干涉、制裁的手段，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来阻止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与崛起。当前国际体系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综合国力的绝对优势之上，一直以来美国都是该体系的主导者。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平衡，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衰退。但是，“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对于霸权的眷恋不会消失，对于建立紧密同盟的希望也不会减弱，领导世界的意愿依然存在并可能再度升温”^②。这显然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重大挑战。全人类共同价值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不对其他国家搞三六九等，不以自我为中心在国际上划分圈层，主张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坚持主权平等，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③，这一价值共识与认同能够有效应对中心国家的挑战。

再次是国际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挑战。基于理性人假设的集体行动逻辑理论认为，个人不会为实现共同利益而行动。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④可见，理性人假设的集体行动逻辑理论缺乏对价值认

① [德]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6页。

② 秦亚青：《世界格局的变化与走向》，《世界知识》2021年第4期。

③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2021年第1期。

④ [美]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页。

同的关照。之所以认为个人不会采取实现共同利益的行动，是由于其价值指向的是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零和博弈关系。但是面对任何共同体都有共同利益这一客观事实，在一国范围内的集体行动，由国家政权的强制性力量对个体进行规制，以达到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协调发展。当这一逻辑扩展到国际范围，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具有强大主体性力量的国家只有在对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正确的价值认同上，才能够突破国际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若要形成这样的价值认同，就要探寻不同个体价值观念中的共同因素，即全人类共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凝聚价值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公平价值取向，在这一价值指向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承认差异基础上的多样、开放、合作的公平观，是一种开放而非封闭的认同，这一价值共识与认同能够有效化解国际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

最后是文明冲突的挑战。不同文明之间能否和平共处、交流互鉴取决于其价值观念是否开放和包容。人类文明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文明在各个方面存在重大差异。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①不同的文明本无优劣之分、高下之别，但是有数百年资本主义扩张史的西方国家形成了我优他劣、我高他下的思维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纳入自身体系的同时，也试图以自身标准同化其他类型文明。对此，英国学者汤因比一语道出了其奥秘。他说：“西方社会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已经把所有其他现存文明和原始社会卷入到波及全球的西方化浪潮之中。”^②其结果既造成了旧有国际体系中文明冲突思维的凸显，同时西方中心主义的旧有思维方式又激化了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当冷战结束后，习惯于零和对抗思维的、自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失败、笃信“历史的终结”的西方国家，开始寻找新的冲突，最终在头脑中找到了“文明的冲突”幻影。这无疑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了巨大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需要以新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文明之间的关系和相处之道。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③，对它的认同能够为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交流互鉴奠定基础。基于此，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才能深刻理解“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④这句话的深刻蕴涵，才能有效化解“文明冲突论”的误导与挑战，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可见，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定的价值观基础，确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性，即它是“善”的。人类基于对“善”的共识与认同而形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与认同，如此一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具有外在联结性的共同体，更是一个具有内在凝聚力的共同体。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实践场域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抽象的永恒的价值，而是有其历史的、具体的现实主体、时代边界及实践平台，而这些都存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实践场域中。

1.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现实主体

价值是“客体的作用同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是客体对主体的某种意义”^⑤。一般说来，价值存在于主客体的实践关系中，主体尺度是其根本尺度，价值的真假取决于其主体的真假。我们批判西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② [英] 汤因比：《历史研究》（下），郭小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92页。

③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求是》2021年第16期。

④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2019年第9期。

⑤ 李德顺主编：《价值学大词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61页。

方“普世价值”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将抽象的人作为主体。正因为不存在抽象的人，所以不存在“普世价值”。正是因为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现实主体，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真正有展示其现实性的平台与载体。那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主体究竟是谁呢？顾名思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是“全人类”，但是这个“全人类”是历史的、具体的、今天的和未来的“全人类”，“全人类”的历史性、具体性、现实性与未来性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人、当代人和未来人所书写和擘画。

首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全人类是通过一定的交往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①这一论述指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是“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它具有以下历史阶段性特征：第一，其联系的紧密性前所未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全球一体化不断走向纵深，各交往主体之间联系的紧密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地球村”日益显现。这一紧密联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联系，而是由世界多极化中的政治合作、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分工、文化多样化中的交流互鉴等内在机理构成的，即面对共同利益、共同问题、共同命运而必须相互合作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第二，在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过程中呈现出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世界历史开始以来的国际联系，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是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格局。当前这一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促使世界格局越来越朝着均衡方向发展。第三，在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中，霸权主义阴魂不散，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外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对全球朝均衡方向发展带来了极大挑战。如全球合作抗疫就遭到某些国家“疫情民族主义”和“疫苗民族主义”的干扰和冲击，使全球抗疫长时间处在“至暗时刻”，给全人类健康和生命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伤害，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增添了障碍。

其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既承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尊重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特殊利益。进一步讲，全人类共同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的相通性越来越强烈，只有尽力追求和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民族国家利益。当今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主张和维护的人类共同利益既真实又重要，它远远超越了历史上所有虚假共同体所声称和维护的共同利益。在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中，资产阶级将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包装成人类的共同利益，将发达国家的局部利益伪装成所有国家的全体利益，这些无疑是虚假的共同利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场域中，共同利益是“相互依赖状态下国家利益存在共性或趋同的部分，由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所构成，并在双边、多边和全球框架内形成国际合作的基础”^②。一言以蔽之，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场域中的、超越虚假共同体虚假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价值诉求与价值期许；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真正有展示和运用的现实对象、具体载体和实践平台。

最后，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否认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而是承认其文化和价值的特殊性。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形态、政治制度、发展水平，除共性或趋同的部分外，一定存在个性或相异的部分，我们必须承认并尊重所有国家的特殊性，并使之成为双边、多边和全球框架内国际合作的重要原则。因此，“全人类”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质，是存在于各个特殊性价值观念中的普遍性因素，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好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导向求同存异的实践对象和载体。

①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页。

② 刘笑阳：《国家间共同利益：概念与机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2.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划定时代边界

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具体内容都是在具体时代中的特定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也不例外，它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划定的时代边界内进行阐释的。因此，划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边界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性。

所谓时代性，主要指一个时代的特征与性质，而决定一个时代性质的根本因素就在于哪个阶级占据时代的中心。列宁曾经指出：“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①从这一论题出发，可以得出当前时代的“两点论”性质：“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依然处在时代的中心，当今时代依然是‘资产阶级时代’这一大的历史时代，同时又是资产阶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中‘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相对小一点的历史时代，还要看到矛盾的运动和转化，看到金融帝国主义的相对下降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总体上升，看到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②正确把握当今时代的“两点论”性质，是今天我们探寻和确立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和依据。

根据“两点论”的时代性质，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资产阶级大时代中孕育的新的共同体形式，是既充满生机与活力，又有光明前景的新事物。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新事物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不断扬弃旧事物和不断增添新元素中形成、发展和壮大的。以发展的眼光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资本主义的虚假共同体，它不断超越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腐朽与落后因素，如对西方主导、西方优先、西方单赢的发展模式的否定与超越；它不断发展真正共同体的进步因素，如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但与此同时，当前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没有充分成长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真正的共同体。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它弱小、尚未发育成熟，就否定它的真实存在，就忽略它的时代价值；相反，我们更应当关心它、培育它，充分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性特征，注意它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划定的时代边界。

在这一时代边界内，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它揭穿了“普世价值”的虚假性，探寻出存在于各个价值观念特殊性中的真实的共同性因素；它克服了“普世价值”的排他性，探寻到各种价值观念的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它突破了“普世价值”的封闭性，在开放世界中追求价值观念的包容性。

3.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实践对象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空洞的纯思辨的思想观念，而是需要体现在具体的实际行动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我认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③这实际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方案，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实践对象。

坚持建立伙伴关系，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国家之间要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在这一伙伴关系中，大国之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大国对小国平等相待，任何国家不随意发动战争，不破坏国际法治，彻底消灭核武器。可以看出，这一伙伴关系具有鲜明的和平价值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3页。

② 李慎明：《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辨析》，《红旗文稿》2015年第22期。

③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2021年第1期。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1页。

导向。这种和平不是建立在强权、控制、均势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平等、尊重、公平、正义基础上，其结果不是强权没落后的失控，也不是均势失衡后的动荡，而是持久的和平、不断发展的和平、走向民主与自由的和平，鲜明地体现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导向。

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各国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①安全是普遍的，没有国家能够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前提下；安全是平等的，建立在不平等地位上的安全是不可持续的；安全是包容的，与其他国家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一定是不安全的。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作；没有每个国家自主决定本国事务的权利，就没有合作与安全。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实践要求。

坚持在合作共赢中发展经济，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它依托的是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是正视并克服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的经济；它推动的是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是要在经济中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中国将以更负责的精神、更开放包容的胸襟、更高质量的增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②简言之，这是和平基础上的发展、公平正义的发展，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导向下的发展实践。

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承认文明多样性，承认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首先要尊重不同民族和国家孕育的不同文明；包容以宽容为基础，包容需要在尊重基础上对不同文明持宽容态度；在宽容的基础上实现包容，推动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系牢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③只有在文明共处的这种状态中，才可能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目前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现象严重，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任重而道远。清洁美丽的世界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没有和平的世界既不会清洁，也不会美丽。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要转变生产方式，生态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转变生产方式，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系统治理、以人为本。解决生态问题，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要树立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观，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要旨、以有效行动为导向”的多边主义，携手合作、持之以恒、重信守诺；要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④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可见，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本身就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践行。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54-356页。

②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11页。

③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年第15期。

④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4月23日。

总之，正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才有了一个具体的运用对象和实践载体，才成为了一个具有现实主体、时代特征、实践对象的“真”价值，这正是它与西方虚假的“普世价值”的根本区别所在。

三、要从“两个大局”出发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我们谋划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需要我们在两个大局的统筹与把握中，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1.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表达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国翻天覆地的大事，而且是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打破了世界对西方发展模式的盲目崇拜和路径依赖，开创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与此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世界意义本身并不能直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而是需要有合适的、能够获得国际社会认同的话语表达。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表达。

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意义的公共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促进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以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促进着所有国家的普遍交往，增进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彰显着全人类共同的善，弘扬着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它本身包含并推动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大事件显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人类长远发展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

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意义的整体性表达。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而言，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与概括，并在各个方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然而，只有当这些理论成果整合形成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意义表达，才能更好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意义的国际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大事件本身具有世界价值和历史意义，它在给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的同时，也提供了蕴含其间的中国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整体性表达，我们在向国际社会表达这两个概念时，传递给世界的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世界格局的合理均衡、国际交往的公平正义、人类发展的民主自由的整体印象和美好愿景。

2.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②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各个国家都在寻求应对变局的方案。然

^① 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② 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 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1年4月21日。

而，环顾全球，我们发现，“撕裂的美国”以对抗的零和思维对待世界，越来越成为世界分裂的制造者；俄罗斯在寻求其战略突破中困难重重、挑战不小；内部矛盾复杂多变的欧洲形成共同目标和共同战略的难度不断加大，而英国脱欧只是其冰山一角。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中国给出的方案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方案是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明确回答时代之问，有效应对时代挑战，解决时代问题，走向美好未来的正确方案。

中国方案是超越旧理念的方案。西方国际体系的理论前提假设是英国学者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即“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①状态，认为为了避免自然状态的血腥与悲剧，人们基于理性建立了国家，但在国家建立之后，国际政治领域依然存在自然状态。这一学说深深地影响着后来者，直到今天，现实主义者仍然认为“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②。由于在国际政治中无法建立一个像国家那样的具有权威的政治实体，为了调解国与国之间的纷争，避免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西方国家依据理性人假设，开启建立国际体系的探索，认为国家间的关系就是零和的、对抗的，国家间的相处是分三六九等的，国家安全建立在所谓的“均势”或者绝对实力的基础上。中国方案吸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基因，秉承“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与情怀。基于此理想与情怀的中国方案超越了陈旧的、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西方理性人假设的思维定式，坚信国家间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国家间相处是平等、互相尊重核心利益的，国家安全是需要共同合作的、综合可持续的国家安全。

中国方案是超越旧秩序的方案。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的国际体系，每一次演变都有效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但都没有真正解决人类的和平发展问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各个强国在维持均衡的名义下不断争霸；维也纳体系的终点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被列宁评价为“靠凡尔赛和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③；处于雅尔塔体系的当今世界面临严重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究其原因，均是因为这些体系都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而构建出的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国际体系，是由少数人决定多数人命运的不公平的体系。中国方案在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基础上，推动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体系，构建新型的平等互利、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在新型国际体系中，伙伴关系是平等相待、互商互量，安全格局是公平正义、共建共享，发展前景是开放创新、包容普惠，文明交流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生态体系是尊崇自然、绿色发展。

中国方案是对在旧有体系塑造和影响下的人类前途天花板的突破。欧洲强国建立在“均势”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始终走不出“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均势被打破—国际体系无法维系—战争—建立新体系”的怪圈；建立在“超级大国实力说话”基础上的、美国主导的当前国际体系，无法摆脱因超级大国实力衰退而出现系统性紊乱的命运。唯有坚持公平、公正、共建、共赢的中国方案，才能建立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面开启中国与世界新关系大门的钥匙

“两个大局”不是相互割裂、相互分离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颜晓峰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环境下形成和展开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变局，不是置中国于局外的变局，中国也是塑造这一大变局的重要力量。”^④只有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才能够真正统筹把握“两个大局”，而全人类共同价

① [英]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5页。

② [美]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4页。

④ 《“两个大局”：信心机遇挑战》，《北京日报》2020年1月13日。

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密钥。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与世界互动的历史性进程中逐步探寻出来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无根之木，也不是仅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主观臆想，而是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历史性地生成的，是对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准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此基础上，不断学习、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长处和一切真正好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请进来、走出去，拥抱世界、学习世界，既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又为世界发展注入生机活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与世界相互影响、相互形塑的程度越来越深入，正是基于这一历史和现实，形成了一系列对外交往的务实成果与有益经验。经过对这些成果与经验的总结与提炼，我们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坚信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为中国带来了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转变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热情，显著提升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水平。”^①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内，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将会更高、范围将会更大、领域将会更宽、层次将会更深。同时，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和平发展是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最大利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通，中国不断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②。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朝着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方向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必然会从经济、技术等层面越来越向道路、模式、制度等方面深入发展。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是不同文明的平等相待交流互鉴、基本利益的共建共赢共享、互相交往的公平正义、全面的良性互动。而越是往深层次发展、越是全面的良性互动，越需要寻求蕴含在不同文明、不同道路、不同模式、不同制度等个性中的共性，找到蕴含在不同特殊性价值观念中的普遍性，即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增进价值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今天，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世界各国只有认清形势、辨明趋势、顺应大势，站在历史潮流的一边、人类进步的一边，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与共、通力合作，同心打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之光普照大地，让发展之利惠及世界，让公平之路通达全球，让正义之声传遍人间，让民主之治兼善天下，让自由之美遍布寰宇，才能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创造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新文明！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2021年第1期。
- [2]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求是》2021年第16期。
- [3] 李慎明：《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1期。

（编辑：刘曙辉）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6页。